

Yongfen lou miji (《涵芬樓秘笈》), *Yongfen* 應作 *Hanfen*。頁353注78, *Zhongzheng Bookstore*(正中書局), *Zhongzheng* 應作 *Zhengzhong*。頁355注4, *Qingzhu Deng Guangming Jiaoshou jiushi huadan lunwenji*, ed. Tian Yuqing et al. (*Shijiazhuang*, 1977), 1977實1997之誤。頁356注8, *William Roure* 應作 *William Rowe*。頁357注34, *QDHDSL*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參照頁330縮寫表, 應為 *QDDQHDSL*。頁358注43, 胡敏:《蘇州狀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年), 頁261–334, 疑作者張冠李戴, 將李嘉球所撰同名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3年)與胡書相混淆。按胡敏書僅146頁, 李書則為343頁, 注中徵引者應為李書。

四、音譯部份:因《文化史》所用的為 *Wade-Giles* 拼音法, 本書則改用現時最通行的漢語拼音, 致書中部份音譯未及更新, 呈現兩歧。頁39行5, *Chu [Di 朱棣]* . . . , *Chu* 實 *Zhu* 之誤(參見同頁行3)。頁57行21, *yu kaoju*(有考據)當作 *you kaoju*。頁170行20, *Li Teng*(李登)當作 *Li Deng*。頁192行10, *Zeng Holing*(曾鶴齡)當作 *Zeng Heling*。頁339注93, “*Wujing Daquan zhi xiuzuan ji qi xiangguan wenti tanqiu*”, *tanqiu*(探究)為 *tanjiu* 之誤。頁340注116, *Hu Kuang*(胡廣)當作 *Hu Guang*。頁381注89, *Taiping tianguo zhidu chuta xia*(《太平天國制度初探》下), *chuta* 應作 *chutan*。

本書最大特色, 厥為對明、清時代經不斷發展而形成的科舉考試的內容敘述詳細, 對圍繞科舉制度的文化現象的描畫, 更是入木三分。這是一本明、清科舉制度史的重要論著, 殆無疑義。作者為避免一般讀者迷失於細節, 於是將《文化史》改寫成本書。遺憾的是, 對一般讀者來說, 閱讀本書不會是寫意的事; 書中大量徵引的科舉考試原始資料及相關典籍, 除專門研究的學者外, 一般讀者大概相當陌生, 無法一一辨識無訛。令人費解的是中英辭彙表及徵引書目竟付諸闕如, 書中經常引用的原始或二手文獻, 則以縮寫代替, 徒增讀者不必要的負擔。

何漢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 Edited by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Rudolf G. Wagner.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 Pp. x + 472. €129.99.

對閱讀英文書刊的讀者而言,「西方漢學家」一詞的含義總是模糊不清。它既可指在英美兩國工作的中國研究者, 也可指用英語發表但在歐洲工作的中國研究者。當然, 一如其他行業, 今天的「西方漢學家」也是自由流動; 不少在英美受教育的中國研究者遷移到歐洲工作, 同時不少在歐洲受訓練的中國研究者轉移到英美地區發

展。但總體來說，歐洲的中國研究者與英美的中國研究者，在風格上往往有顯著的差別。差別所在，是歐陸學者比較重視深遠的文化承傳和東西文化的互動。他們並不強求標奇立異，一下子建立一套新的理論，大破大立；而是埋頭於文獻的細膩分析，在一點一滴、一字一句的基礎上尋找歷史的複雜痕跡。

這種歐陸式的中國研究特點，我們在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和 Rudolf G. Wagner 合編的 *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 可以清楚看見。*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下文簡稱「是書」) 包括十二篇文章，其中四篇由華人學者李孝悌、夏曉虹、陳平原、鍾少華撰寫。其餘八篇文章由 Iwo Amelung、Natashca Gentz、Andrea Janku、Barbara Mittler、Douglas R. Reynolds、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Rudolf G. Wagner 和 Catherine Vance Yeh 八位「西方漢學家」執筆。八位「西方漢學家」除了 Reynolds 是美國學者之外，其他都在歐洲（尤其是德國）受訓練或當過研究員。是書雖然是論文集，但主題鮮明，重點清晰。各篇文章都是討論晚清百科全書的編輯與流通，進而分析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出版業蓬勃發展的原因和新知識系統成立的曲折過程。更重要的，是十二位作者都充分掌握文獻，立論有根有據。為了證明持之有故，十二位作者都引用大量原始資料，並且中英文對照，讓讀者一目瞭然。

若從 2004 年開始計算，是書是歐陸學者討論晚清新知識系統的第三本論文集。前兩本論文集——Natascha Vittinghoff 與 Michael Lackner 合編的 *Mapping Meanings* 以及 Rudolf G. Wagner 編的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對晚清印刷術的發達、沿海租借地新知識階層的冒起、新媒體（包括雜誌、期刊、新聞報紙）的傳播功能都有深入討論。¹ 相比之下，是書的特色是在前兩本論文集的基礎上，以百科全書為切入點，集中分析晚清「新政時期」（1901–1911）新知識系統的實際內容。誠如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和 Wagner 在書中〈序言〉所說（頁 1–29），百科全書不僅是工具書，方便讀者查閱資料；它其實是現代「知識體系」（the taxonomy of knowledge）的具體表現，把片段段、零零碎碎的「新知識」連貫起來，變成一個龐大的西學系統，使報館裏的編輯、學校裏的老師和學生、社會上的知識青年、安在家中的主婦，都可以明白甚麼是新學問、新社會、新文化。

換句話說，百科全書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力量。它並不需要大鑼大鼓宣揚「共和國」的優點和「新國民」的特色，而在潛移默化和生活小節之中，靜悄悄地引導中國青年接受新社會的新規範。更有趣的，是晚清時期的百科全書並不是由官方組織的，也不是早有方案一律按本子辦事，而是各個地方的新知識階層利用各自的資源，在邊學邊做、誤打誤撞的情況下建立一套既有系統又富彈性的西學體系。

¹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ed. Natascha Vittinghoff and Michael Lackner (Leiden: Brill, 2004);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ed. Rudolf G. Wagner (Albany: SUNY Press, 2007).

王德威曾經把晚清文學形容為「世紀末的華麗」。²同樣地，晚清的百科全書也可以說是一種「世紀末的華麗」。它華麗的地方，是顯現了晚清新知識階層活潑的創造力和驚人的聯想力，有辦法把五花八門的「西學」系統化、制度化、具體化。

是書的十二篇文章，其中八篇的中文版早已於八年前出版。³八篇文章之中，夏曉虹、陳平原、鍾少華三篇原本是中文撰寫的，在是書只是英文翻譯，而且翻譯時常有詞不達意的地方。讀者欲窺原貌，應看中文原文。其他五篇文章 (Amelung、Gentz、Mittler、Doleželová-Velingerová、Wagner) 則反過來，原本是英文撰寫的，是書的版本比中文翻譯版更詳細。讀者欲充分了解五位西方學者的觀點，閱讀英文版比較可靠。是書加入了 Reynolds 和 Yeh 兩篇文章，令論文集生色不少。Reynolds 的文章凸現日本明治維新對晚清的影響，對了解百科全書引入中國的複雜過程貢獻良多；Yeh 的文章加深我們對百科全書的社會影響，貢獻也不少（這兩點後文將有補充）。

在〈序言〉裏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和 Wagner 指出，他們研究晚清的新知識系統，是在機緣巧合之下，才找到百科全書作為切入點（頁 1-2）。機緣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兩位學者通過閱讀鍾少華《人類知識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書研究》，⁴得悉晚清流傳下來不少百科全書，可以開展研究。在原著裏鍾少華已經突顯日本對中國的影響，為研究百科全書的「中日交流」奠定了基礎；二是 2004 年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在多倫多大學圖書館裏無意中找到黃人（摩西）編的《普通百科全書大辭典》（1911 年），啟發她對研究百科全書的興趣，也因這個機會與北京的陳平原認識，一起合作研究「百科全書」與「百科詞典」的關係；三是經多年艱苦經營 Wagner 在德國海德堡大學建立了中、日、英三種語文的百科全書數碼資料庫（簡稱 HEIDENC），從全球各地收集了一百多本清末百科全書的資料。

是書的十二篇文章，可以說大部分是這三個機緣的產品。例如鍾少華的文章是他 1996 年書的一個延續，繼續探討作為「人類知識的新工具」的百科全書的分類方法（頁 425-51）；陳平原和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的兩篇文章專門分析黃人的《普通百科全書大辭典》（頁 239-328）；Wagner 的文章利用海德堡大學的數碼資料庫資料寫成（頁 103-36）；其他的文章，直接或間接地利用了海德堡大學數碼資料庫的資料作佐證。

若從內容分析，十二篇文章可以歸納為從四種不同角度分析晚清百科全書的重要性。第一個角度是中國傳統類書與新式百科全書的關係。討論這兩者的關係，其實就是探問現代化過程中「傳統」與「現代」的連貫與斷裂問題。在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大行其道的時候，一般的看法是現代化過

² 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2.

³ 見陳平原、米列娜（主編）：《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⁴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6 年。

程的特徵是與「傳統」割裂，必須打破舊社會才有辦法建立新社會，在除舊布新的情況下發展「現代」的政治體系與社會形態。在中文圈子裏，這種思維的代表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反封建、反禮教。但到了八十、九十年代「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興起後，學者不再強調「新」與「舊」的對立，反過來強調「新」與「舊」的結合和互補，把重點放在不同地區的現代化模式，從而凸現各個地方在現代化過程中所發揮的「現代性」。

對「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書中的作者持不同的看法。一方面，Wagner 在〈序言〉中強調傳統類書主要是為準備科舉而設，與百科全書宣傳「現代文化」是兩碼子事，不論在在編排上或是內容上差別甚大(頁6-18)。陳平原在他的文章裏也持相同觀點，突出傳統類書(例如《爾雅》、《太平御覽》)的「局限性」(limitations)，證明新式的大型知識性刊物必須在編排上作大革新，才能適合新時代的需要(頁243-44)。另一方面，Mittler 卻認為類書與百科全書是一脈相承，尤其是在具體的「知識的分類方法」(types of knowledge and classifications)很相似。正是這個原因，她認為中國讀者才有可能在短短五十年之內廣泛地接受百科全書的新知識體系(頁400)。很可惜，三位作者都只是各自表述，沒有正面展開討論，也沒有拿出翔實證據支持各自的觀點。對於類書與百科全書的關係(以至「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是書只能說是提出了問題，但沒有解答問題。

是書第二個角度是分析晚清百科全書的引入過程。對於此一過程，書中大部分作者的看法是一致的。首先是來源。書中作者認為，晚清百科全書是從日本傳進來的，並非從西方直接進口。他們的證據是，在晚清時期曾經有書店嘗試把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翻譯為中文，但因種種原因總不成功；反而日本式的「百科全書」(hyakka zensho) 卻很快經由翻譯(或半翻譯半改造)傳入中國，成為出版業爭奪讀者、打開市場的捷徑。是書中 Reynolds 的文章對日本的影響分析最詳細。多年前，Reynolds 寫了一本討論晚清「新政」的書，⁵一方面證明「晚清新政」在政治、社會各方面的改革是一種革命性的突破，故此「晚清新政」應該稱為「新政革命」；另一方面指出日本明治維新對「晚清新政」的重大影響，很多新政的實際改革內容原來是源於日本的。相隔多年，Reynolds 仍然堅持當年的看法。在文章裏，他引用大量證據，證明明治時期的百科全書(例如《帝國百科全書》、《日本百科全書》)經過中國外交官、中國留日學生和租借區書商的推介，在短短幾十年間傳入中國，成為「新學」和「西學」的典範(頁137-82)。Reynolds 在文章的結語特別提出有需要集合中、日兩國專家的力量，利用各自的語言優勢，考查晚清百科全書背後的日本影響。他覺得不把晚清百科全書背後的日本「隱蔽影響」(hidden impact)弄清楚，是沒法說明晚清百科全書特質的(頁182-83)。

⁵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雖然 Reynolds 的建議對一些讀者來說可能是有點極端，但是書中大部分作者（尤其是西方學者）基本上是贊同 Reynolds 看法的。他們都認為百科全書引入中國，來源是日本。若細緻分析的話，日本的影響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體例，諸如我們習以為常的「凡例」、「項目」、「索引」、「科學」等詞彙及背後知識的分類法，都是從日本引進的（見 Reynolds 文章，頁 165–76；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文章，頁 292–97）。二是百科全書的讀者群。就是說，百科全書的編纂並不是為了滿足科舉的需要，故此重點不在收集經書、史書的材料；而是面向各行各業的廣大讀者，因此內容包羅萬有，又與生活息息相關，從天象時序與地理數學，到家務雜事與婦女修容，都包括在內（見 Yeh 文章，頁 367–98；Mitter 文章，頁 399–424）。

不過，儘管書中大部分作者（尤其是西方學者）都贊同晚清百科全書的體例與部分內容來自日本，但他們並不忽視「在地因素」，對引入後百科全書的流通和變化作詳細的分析。這方面，書中作者特別強調三種在地因素。第一是自甲午戰爭後中國文化界對「新學」、「西學」的熱烈討論，形成一股大氣候，鼓勵讀書人追尋新知識，掌握新學問。結果是造成一種市場動力，令出版商、書局編輯不斷想辦法改進出版質量，以迎合讀者的需要（見李孝悌文章，頁 29–54）。

第二是科舉廢除後，舊的經、史、子、集四部失卻了往昔的權威，代表新知識系統的百科全書取代了四部的地位，成為廣大讀者爭相購買的「新學」產品（見 Amelung 文章，頁 85–102；Janku 文章，頁 329–67）。這方面，Wagner 根據海德堡大學數碼資料庫的資料，發現晚清印行百科全書，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數量。總的來說是 1901「新政」啟動後出現第一個高潮，然後到 1905 年科舉廢除後出現另一次更大的高潮（頁 103–37）。Wagner 的發現，間接證實廢除科舉對百科全書流行所起的重大作用。

第三是中國出版界並非一成不變從日本引進百科全書的體例，它們至少在三個不同地方作出創造性的轉化。一是新聞報紙的材料大量引入到百科全書裏，打通「日日新」的新聞報道與「眾納百川」的百科全書的關係（見 Gentz 文章，頁 55–84）；二是百科全書的編輯在創造一套新的編排次序時，往往借鑑已經通用的字典、辭書的風格，故此早期的百科全書不少是稱作「百科辭書」或「百科詞典」，例如黃人《普通百科大辭典》（見陳平原文章，頁 272–83；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文章，頁 297–313）；三是在建立中國式百科全書體例的過程中，中國編輯曾經採用《尚友錄》之類按照人名筆畫的分類方法。雖然後來中國百科全書大都採用英文字母的分類，但是不能忽略人名筆畫分類法的影響（見夏曉虹文章，頁 191–237）。

值得注意的是，當幾位學者強調在地因素時，他們並不是否認日本的影響，而是認為新政時期百科全書流行，是國內、外兩種因素一同起作用，並不是單純外國力量或國內力量，便可以改變中國的文化面貌。幾位作者的多元和合、眾聲喧嘩的研究態度，很值得我們借鑑。

是書第四個角度是百科全書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在「閱讀史」(History of Books)的研究裏，最大的難題不是追蹤書報的出版和流通，而是衡量書報對讀者所產生的影響。一向以來，史學界不大願意研究「讀者的接受程度」(readers' reception)。原因無它，是材料不足。一則無法找出確實數據，證明有多少讀者讀過某一本書或某一刊物；二則無法找到大量的日記、筆記，證實某一本書或某一刊物對某一個讀者的確實影響。雖然如此，書中 Yeh 與 Mittler 試圖對晚清百科全書的社會影響作出初步的探討。兩位作者都集中分析 1919 年出版的《日用百科全書》，時段上是超出了晚清的範圍，但優點是突出百科全書對創造「新女性」的重要性。在分析「新女性」的創造過程，她們首先回溯日本明治時期構造「賢妻良母」的形象，然後根據《日用百科全書》的內容分析各種對「家庭主婦」的要求，諸如「家政」、「保育」、「容儀」、「時間」、「運動」、「體操」等等(見 Yeh 文章，頁 376–94；Mittler 文章，頁 403–18)。

從量化史學的角度來衡量，兩位作者還是沒有提供確實的數據，具體證明讀者的接受程度；但是從研究知識系統的角度來看，她們已經走出重要的一步。就是從百科全書的體例，推想出一百年前對「新女性」的要求。在現實生活裏，百科全書對「新女性」的要求不一定原封不動地照搬照辦，但是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個大輪廓、一個大方向。正如 Mittler 在文章結論中說，不論在歐洲還是在中國，百科全書流行，不但證明了民族國家已經建立，也證明了大眾廣泛接受「國民」和「新女性」，成為民族國家裏的男女性別的身份象徵(見 Mittler 文章，頁 418–23)。故此，要認真研究近代中國「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特性和演變過程，我們不能不研究百科全書的引入和發展。此說的確是真知灼見，不啻這本論文集送給我們最珍貴的禮物。

韓子奇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 Geneseo 分校歷史系

The Body Incantatory: Spells and the Ritual Imagination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By Paul Cop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xxx + 363. \$55.00.

This is a book about the dhāraṇī, those strings of syllables based on the phonology of Sanskrit that played and still play a major role in all Asian cultures touched by Buddhist influences whilst for the most part attracting little attention from non-Asians interested in Buddhism. A monograph that puts them at the centre of a focused research project has long been overdue, and one that confronts specifically the copious material legacy in the form of epigraphy and printed and manuscript sources that they have bequeathed from the China of the seventh to tenth centuries